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可以说我们都是“五四”的后代。我们都知道，近代西方的面貌，很大程度上为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塑造。但是当欧洲的思想和社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仍是自成一体相对封闭的状态，思想、观念和制度几乎没有受到冲击。一直到20世纪初，“五四”运动爆发，启蒙的理念才开始系统地传到中国来。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儒家文化的命运

卢晖临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汉代形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成为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影响广大老百姓的观念形式。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明代中晚期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论，这种社会变化向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出了挑战，而儒家文化也迎来了一次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家知道，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不太讲“利”的，以“义”制“利”。明代中晚期，一批学者开始在儒家体系里讨论“利”的问题，如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王艮、何心隐等，并在民间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可以将泰州学派看作是儒家文化自新和转化的一种努力，尽管非常艰难，历经挫折，但蕴藏着生机。非常遗憾的是，这一自新和转化的历程被满清入关中断。满人以百万之众统治百倍于己的汉人，除依仗军事之强力外，还特别借助文化象征的力量。满清推崇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收复汉人知识分子及民众的一种妥协，但是却不允许思想创造活动。在文字狱的禁锢政策下，知识分子只能靠埋头于经书之中保全和消遣生命。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

如果你想直面时代挑战、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家是很困难的。清代晚期的龚自珍写过一首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好像大家觉得他纯粹在讲人才，其实他是针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一潭死水，不愿意面对新时代做出改变的现象而感到忧心。

中国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对封闭的体系中独立发展，没有受到太多太大的外来冲击。但是进入18世纪发生了变化。18世纪在中国是“乾隆盛世”，而在遥远的西方，以英国为代表正进行着朝气蓬勃的工业革命。正是在这个世纪的末年，两大帝国相会了！有人说，中西方早就相会了！没错，早在元代，意大利马可·波罗就到了中国，其后传教士商人到中国的还有不少，不过都是以民间的方式。18世纪末年的相会是一个重大事件，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视作是中国和西方现代工业世界第一次的正面接触。1793年，受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派遣，马葛尔尼率一支庞大

的使团，历经近一年的海陆跋涉，来给乾隆祝寿，当时乾隆 80 大寿。马葛尔尼来访的目的当然不仅是祝寿，而是借此机会寻求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开拓中国市场。但围绕马葛尔尼的觐见，双方在礼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英国人寻求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皇帝认为只是贡使，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外交关系。中国人要求英国人对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马葛尔尼坚持不下跪，他说我对我的国王行使的最高礼节是单膝下跪，行吻手礼。双方争论达数月之久，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外部世界如此大的变化的无知。英国人的出访没有任何成果，常驻使节、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人提的这些要求在乾隆听来如同天书。

四十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近代史从这里开始。鸦片战争是中国的耻辱，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海外市场挑起了这场战争。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对战争之前发生的事情交待得并不多，但马葛尔尼访华风波对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英国人斯当东参加了这次出访，当林则徐虎门硝烟后，他在英国国会“慷慨陈词”，坚称发动战争的必要性。民国年间蒋廷黻写过一本很薄的《中国近代史》，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书中说，1840 年以前，中国不愿意给西方以平等地位，1840 年以后，是西方不愿意给中国以平等地位。

在鸦片战争败于英国人二十年之后，“洋务运动”开始了，它的另一个名称“自强运动”很好地体

现了它的意图：通过兴办近代工业，增强中国国力，改变积弱之现状。但这些“洋务派”身上流淌的是纯正的儒家文化之血，对于他们来说，“洋务”更多的是一种器物：坚船、利炮、铁路、工厂而已。在“洋务派”的问题意识中，基本上是不出现对中国文化传统内在问题的反思的，其局限性可想而知。

“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性事件是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中国战败。甲午海战，日本一个小岛国，突然战胜了历史上一直以天朝自居的中国，这对于沉浸在“天朝上国”幻像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打击非常之大。甲午海战后出现救亡图存的口号，康有为说，中国已经是“薪火之上”、“釜底之鱼”，不变不行了，出现民族危机了。

但是，变，谈何容易！两个多世纪来的思想钳制遏制了思想创造和变革的源头活水。普通民众经历与西方世界和日本的一次次战败，屈辱、义愤，却找不到积极的出路。浮在“庚子事变”表面的，是民众对于洋人（洋教）的仇恨和反抗，而潜藏的却是民众（以及朝廷）无路可走的“逃避”心态。义和团数万拳民凭着肉身和符咒去挑战西洋的枪炮

利器，“战争”还未开始结局已可想见。

“庚子事变”后，中国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帝国”并没有马上死去，稍后帝国虽死，却又以转化的形态延续其生命，但帝国的文化体系很快就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进入 20 世纪，激进的反传统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洋务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对传统的攻击，维新变法中也没有，而到了 20 世纪就不同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反传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调。大家都熟悉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是鲁迅塑造出来的一



个人格象征，代表的是不被主流思想所束缚的、有独立思考的人，尽管精神错乱，但恰恰具备儒家文化中成长的人所不具备的批判精神。打倒“孔家店”的一批代表人物，背景各不相同，却均具备“狂人”的这种批判精神，他们批判的重点各不相同，但却形成对中国传统的系统清算。譬如吴虞写过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被胡适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是清算传统，是“去旧”，而“德先生”和“赛先生”则是学习西方，是“迎新”。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认为现在只有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就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大家今天很熟悉的民主与科学。民主、科学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东西，过去中国也提民主这个词，但意义不一样。总结起来，“五四”人士认为只有全面接纳西方的文化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新”字在20世纪初非常流行，简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像“新青年”、“新人”、“新民”、“新女性”等，西方的、陌生的，因其“新”成为时代共同的追逐。相对立的一面是“旧”，传统的、熟悉的东西都是旧的。

把历史梳理了一遍，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脉络和内在的逻辑。那历史是不是必然的呢？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要走现代化之路，要避免亡国亡种的命运，一定要抛弃传统吗？

看我们的近邻日本。作为一

个现代化的后来者和成功者，日本在广泛向西方学习科学、工业和技术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固有的文化传统。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在《德川宗教》一书中指出，正是德川幕府时期的宗教，为驱动日本走向现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中心价值系统”的资源。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认为，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乃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战后由美国引入的现代经济民主主义两者糅合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日本是东西合璧的“儒家资本主义”。而日本学者 Morishima 则将更日本的“成功明确归因于儒教的忠诚特质、民族主义，以及社会集体主义。”



日本，还有东亚四小龙，它们成功的故事各有不同，但给我们的共同启发是，传统和现代性不仅可能共存，而且还可能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从传统到现代，不是如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以现代性取代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经由传统的现代转化发展出现代性。

反过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步履蹒跚，有很多值得总结反思的地方，但最应该汲取的教训是对自身传统的抛弃。很多国家都有殖民半殖民的历史，但大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如此长时间、如此大范围地攻击自身传统的绝无仅有，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受到的伤害也尤其深重。我们的一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甚至直接就是以传统的物质形态的毁灭为代价。譬如，民国以来大力兴办新学、倡导教育，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摆脱文盲处境，本为莫大善事，但大量的庙宇寺观正是在这一时期停止活动，成为最早一批乡村学校的校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农田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乡村工业形成初步规模；但大量的宗族祠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拆毁，用作兴修大坝和工厂的建筑材料。“教育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如此宏大的现代化计划面前，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民间信仰、家族情感，要么被当作必要代价，要么被视作落后残留，没有得到现代化建设者们最起码的尊重。

当然传统有很强的韧性，不是说抛弃就荡然无存，但是持久的强力的批判已经使其碎片化。核心价值湮没，难以担当统摄的作用。各文化要素支零破碎，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重建和复兴将是一个漫长艰巨的任务。■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